

民生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杨启国◎著

云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

转型中国： 站在新的 发展起点上



民生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转型中国：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杨启国◎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中国：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 杨启国著.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1
(民生中国)
ISBN 978-7-5415-6399-7

I. ①转… II. ①杨… III. ①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8165号

出版人 李 维 李安泰
策划组稿 李安泰 杨云宝
责任编辑 李 菁 赵怡欣
整体设计 高 伟
责任印制 张 旻 赵宏斌 兰恩威

民生中国·转型中国：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杨启国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eph.com
开 本	710 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15-6399-7
定 价	22.00 元

总 序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证实的政治定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提出了“图谋民生幸福”的目标，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目标成为他未竟的心愿。

时隔100周年，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动摇，新一轮的发展将更侧重为民谋福祉。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把人民的期待作为工作的动力，表明新一届领导核心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一起继续创造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改善民生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放到一起，专列一篇(第八篇)，明确“十二五”时期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提出要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

人民。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一五”时期，我国民生领域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例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24%的县，约1.4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从4亿人扩大到8.35亿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从无到有，加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4.32亿人；企业职工连续7年提高退休待遇水平，年均增长10%；大幅度提高了教育投入。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同时深化相关体制改革，建立相关的民生绩效管理机制。

财政部在2011年预算草案报告中提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这三个方面投入的增长幅度都高于16%，住房保障方面也达到14.8%，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2011年8%的GDP预期增长幅度。如果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大致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将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29.7%，比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平均低13个百分点，比人均GDP3000美元至6000美元的国家平均低24.3个百分点。现在我国国力增强了，这两年也加大了对保障民生方面的投入，如：2011年人均卫生公共服务经费标准由15元提高到25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由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工矿、林区、垦区等棚户区改造，2011年达1000万套，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等等。但从总体看，财政加大对民生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还是有较大增长空间的。

改善民生，投入很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分析结构问题。而调整结构，有待于相关体制的改革以及相关机制的完善。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一些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存在逆向转移问题，即一次分配的差距，经过基本公共服务二次分配后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种逆向转移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应当扭转这种逆向转移的趋势，在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要实行三个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后发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同时，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结构调整还要求相应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

财力关系，调整城乡分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关系，调整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关系。显然，完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先举一个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企业与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由1990年的1：1.21不合理地扩大到2005年的1：2.1。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投入不算少了，但仍难以平衡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并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待遇水平的相互攀比。2011年“两会”后，我在云南的一次调研中了解到：经连续7年提高待遇后，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养老金不到当地一般小学教师退休养老金的50%。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出发，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尽早统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要再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分别设计不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企业年金或其他补充保险来体现。美国1984年、日本1986年统一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又有一些国家实行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远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历史上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与政府和事业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分开搞两三套养老保险制度，给社会平添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矛盾和纠纷。

“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因改革方向不明确，其推进步履维艰，建议“十二五”时期启动并完成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再举一个不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

“十一五”时期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实力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这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充分肯定。“十一五”时期，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前一阶段各地偏重总量GDP或人均GDP指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经过二次分配反而扩大了，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如：社区卫生机构覆盖率，2007年一些地区达到100%，而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到30%；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2007年上海、北京、天津与江西、贵州、河南等地比，差距达4~5倍，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提高到30万元，西安5万元，南昌3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

率，2009年，广东10.04%，辽宁23.92%，而抚养比广东12.14%，辽宁44.5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还会向发展条件较好、回报率较高的区域集聚，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果以人均GDP大体相当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那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十分困难和相当遥远的事情。因此，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大大弱化GDP指标，突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要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首先，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其次，按照均等化的方向，改革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制度，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逐步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可以先解决省、市、区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进而解决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促使政府履行保障和改善民生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考虑建立相关绩效管理机制。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从2005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出了要“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加快实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制度”。2011年以来，国家监察部成立了绩效管理监察室，国家建立了国务院绩效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我国的绩效管理的试点和推进工作。

但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任务转换为具体的绩效考核目标，并与官员的升降奖惩结合起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课题。长期以来，绩效考核的目标过于偏重GDP，这有其历史的原因。现在，民众的诉求更强调保障民生和公共服务。因此，绩效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加以改进，将“1E”（经济）导向转变为“4E”导向，即经济性(Economy)、公平性(Equity)、效率性(Efficiency)、效益性(Effectiveness)，用“民生指数”代替“GDP崇

拜”，并实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领导评价和公众评价相结合。

尤其要重视外部评价和公众评价。民生改善如何，民众感受最深。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大力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满足公众有序参与立法过程、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和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的热情。公众参与不仅有利于培育群众的公民意识，也有利于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建立公众导向、民生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对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形成一种约束机制，有助于把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变成政府实实在在的基本职能。

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新一轮发展侧重解决的重点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民生中国”系列丛书意义重大。这套丛书是一套大型公益性著作，是反映中国民生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我认为这套丛书的特点和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这套丛书选题具有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编者对民生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选题规模宏大，同时重点突出。客观上说，策划出版这么一套大型丛书是有难度的，学科跨度很大，作者天南海北。民生问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等学科，该丛书作者或者是国内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者是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阵容可谓强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作者基本都有社会调查阅历以及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的机会，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有战略思维，又熟悉政策，能接地气，这就有可能出精品。这套丛书可以作为广大干部思考、破解中国民生难题的政策工具书，也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民生问题的基本参考书。

第二，这套丛书在民生问题的研究上实现了诸多理论创新，为我们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分析和建议。研究中国民生问题，既要在已有理论和政策话语下展开讨论分析，也需要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思考、探索和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

落实，必须以满足民生发展需求为评判标准。这套丛书从民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和界定了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既连着内需，连着转型，也连着公平，所谓民生问题，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物质福利的改善问题。民生发展需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纠正社会初次分配不公，进行二次分配和公共财政体系的制度改革。但民生发展更需要重视发展中的非物质因素，如公平、正义、宽容、自由等等，需要从维护广大群众最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丛书所涉及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所提出的相应政策建议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百年的梦想：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	1
第一节 近代中国：农业社会无奈的落日辉煌	2
第二节 洋务运动：地主阶级遗憾的自救运动	9
第三节 百日维新：改良主义幼稚的美好愿望	13
第四节 辛亥革命：资本主义壮丽的革命空想	17
第五节 造反有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	21
第二章 伟大的转折：中国道路的历史开创	27
第一节 基业初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28
第二节 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勇开创	34
第三节 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完善	38
第四节 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发	40
第三章 辉煌的成就：科学发展的基本前提	46
第一节 经济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举世瞩目	46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治文明建设成就卓著	54
第三节 文化基础：精神文明建设繁花似锦	63
第四节 民生基础：社会文明建设快速进步	71

第五节 生态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局面喜人	75
第四章 严峻的挑战：科学发展的时代呼唤	79
第一节 经济建设形势依然严峻	80
第二节 政治建设期待新的突破	86
第三节 文化建设滞后时代发展	88
第四节 社会建设矛盾日益突出	92
第五节 生态建设问题不容回避	95
第五章 理论的借鉴：发展模式的社会探索	98
第一节 物本主义：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	99
第二节 社会结构：社会体系全面进步的发展实践	103
第三节 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105
第四节 人文关怀：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	111
第六章 理性的抉择：科学发展的路径选择	115
第一节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毫不动摇	115
第二节 落实以人为本为核心毫不含糊	120
第三节 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毫不懈怠	124
第四节 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毫不迟疑	130
参考文献	141
后 记	143

第一章 百年的梦想：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滚滚硝烟惊醒了清王朝统治者的绵绵春梦，这个自我陶醉在农业文明的落日余晖中的中央帝国像打开了棺材盖的木乃伊一样，在近代社会暴雨骄阳的洗礼下分崩离析，灰飞烟灭。从1840年起，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风雨如晦的多事之秋。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那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为避免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

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领导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 近代中国：农业社会无奈的落日辉煌

当清王朝还沉浸在康乾盛世带来的虚假繁荣中不能自拔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挑战旧世界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摧毁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鸦片战争的炮声一朝响起，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被彻底地改变了，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戏剧性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大为震惊。马克思认为，这是一幕令人费解的“奇异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① 西方世界突然在加速前进，航海业的发展冲破了人们之间的空间隔阂。探险家、商人、传教士足迹遍天下，殖民主义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和西方在迅速地靠近，古老的中国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猝然相遇。西方的发展，犹如脱缰之马，腾跃飞驰，一日千里，迅速地脱离传统社会，相形之下，中国如龙钟老人，步履蹒跚，缓慢迟滞。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两者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已不可同日而语。^②

一、东方在封建主义落日的辉煌中暮气沉沉

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② 参见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自康熙时期至乾隆时期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反超。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并且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一是从农业方面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中国当代著名的清史学家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中指出：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访问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奈曾盛赞18世纪的中国农业，他认为：“中国的农业于18世纪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①

二是从手工业方面来看，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就已经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手工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

三是从市场贸易方面来看，市场发育程度不断提升。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流通值约合3.5亿银两，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1.5两。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输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就达到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年，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

^① 参见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

四是从城市建设方面来看，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在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江宁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借盛世疯长，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深刻指出：

“清朝的衰机，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它以异族入主中原，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它的忙。加以其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行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①当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之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向黑暗的深渊。

清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骄奢淫逸和贪污腐败。在清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机体的健康。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81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60多名官吏。最后，王亶望等22人被诛杀，涉案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负责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亶望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最具典型的贪官和珅在乾隆的庇护下大行其道20多年，搜刮的财物价值高达1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国库两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高达白银700多万两。因此，当时有民谚称：“和珅倒，嘉庆饱。”

康雍乾三代英主对正在发生剧变的世界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① 吕思勉：《中国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

与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发展工商业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要么限制其开设，要么控制其流通，要么严格约束工人，要么指定特许的商人，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工商业的发展。在强权面前，工商业奄奄一息、逡巡不前。

清朝历代弥漫着轻视科学技术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学”，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科技专家戴梓发明了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的连珠铳，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朝统治者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梓发配关外充军。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玩赏，根本不在意其中的科技意义和军事价值。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把玩。

1864年西洋人在上海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线，当时引来了以点豆油灯照明的中国人的万分好奇和层层围观。可是短短几天之后，电线就被人割为无数段的断线头，电线杆也经不起中国人的价值偏见而倒地牺牲。一些卫道士认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势必会绝地脉、毁祖坟、坏风水、堕纲常。”所以“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不？”科学技术在传统价值观的“忠孝高于一切”的信条面前败下阵来。无独有偶，1876年7月3日，由英国修建的淞沪铁路通车，守旧分子对此大为不满，无奈惧于洋人而奈何不得。8月3日，火车撞死一人，一下子舆论哗然，庙堂震惊，士大夫纷纷上书称：洋人之奇技必致淳朴民风之破坏，动敦厚之人心，有悖于中国圣学，不利于巩固江山社稷。于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终于上演：清朝地方政府出面，以众怒难犯之由，出价28.5万白银将机车与铁路全部买下，然后征调数百民工将铁轨拆除，铲除路基，恢复黄土。谁曾想见，中国工业文明的萌芽在愚昧的价值观的影响下结局会如此荒唐。

二、西方在资本主义朝阳的照耀下咄咄逼人

春梦易醒，好景不长。康乾盛世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

以产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社会变革，将西方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革命席卷欧洲，特别是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发现后，大批科学成果接连诞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毛织品、煤、生铁产量成几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随着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西方国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欧洲列强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已成为现实。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开始席卷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在生产中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蒸汽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成几倍几十倍的提高。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18世纪60年代，巨大的熔铁炉开始运用，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开始腾飞。据统计，1776~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英镑，24年间增长5.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